



世界投资报告 2022

国际税收改革与可持续投资

概 述



联合国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世界投资报告 2022

国际税收改革与可持续投资

概 述



联合国

2022年，日内瓦

© 2022年, 联合国

本出版物供开放获取，但须遵守为政府间组织订立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igo/>。

本出版物任何地图所用名称及其图表内材料的编排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本出版物提及任何公司或许可程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对其表示认可。

文中资料可影印和转载，但须注明出处。

本出版物经外部编辑。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印发的联合国出版物。

UNCTAD/WIR/2022 (Overview)

序言

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达到1.6万亿美元。在宽松的融资条件和基础设施刺激措施的推动下，跨境交易和国际项目融资表现尤为强劲。然而，对工业的绿地投资仍然复苏乏力，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实际生产性投资的这种脆弱增长在2022年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乌克兰战争的后果以及粮食、燃料和金融三重危机，再加上当前的新冠疫情和气候异常，导致压力增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已经下调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国际投资的复苏势头很可能会过早陷入停滞，从而阻碍推动可持续发展融资的努力。

《世界投资报告》监测全球和区域投资趋势以及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发展动态，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支持。本报告审查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投资情况，还研究了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中的可持续金融趋势。

未来几年，国际税收制度将实施根本性改革。预计这些改革将对投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利用财政激励措施和经济特区的国家。今年的报告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南，帮助他们厘清复杂的新税收规则，调整他们的投资策略。我向所有参与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的人推荐这份报告。



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前言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全球的国际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战争爆发之时世界尚在疫情影响中举步维艰。这场战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周边地区，导致的生活成本危机触及全世界几十亿人，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减少了实际收入，加剧了债务压力。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规避行为可能会给今年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

战争对2022年及以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影响难以预料。除了直接影响到在该地区有密切投资联系的中亚国家之外，战争对其他国家将主要产生间接影响，这取决于这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冲突造成的三重危机及其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影响，而这些是影响国际私人投资决定的关键因素。回顾以往，上一次粮食价格如此高企不下之时(2007-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60多个国家发生了骚乱。

其结果将对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对生产能力、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目前这些领域的投资趋势并非都令人乐观。尽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21年强劲反弹，但工业投资依然疲弱，远低于疫情前水平，特别是在最贫穷的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基础设施、粮食安全、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健康方面的项目融资)正在增长，但不足以在2030年前实现目标；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投资)正在蓬勃发展，但大部分投资仍限于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仍然远远落后。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新出现的迹象表明，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成为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挫折，此前承诺减排的国家将增加矿物燃料产量。2022年第一季度，在5,000家最大的跨国企业中，大部分都下调了2022年盈利预测。令人惊讶的是，虽然采掘业上调了预

期收益，其中石油和天然气上调了22%，煤炭上调了32%，但可再生能源公司公布的预期收益平均下调了22%，使人不禁认为目前的状况有可能逆转多年来在可持续能源投资方面取得的进展。其令人担忧的是，2021年，全球能源燃烧和工业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碳排放量回升，达到有史以来年度最高水平。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让更多资金流到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但也必须作出重大努力调动国内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由二十国集团和经合组织主导的国际税收改革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我们在本报告中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改革旨在确保跨国公司在其经营地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因此有可能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收入。

然而，乌克兰战争使发展中国家在国内调动资源更加困难，而新冠疫情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更加频发已然使这种情况恶化。债务水平不断上升且不可持续，此时却没有适当的多边重组机制，各国在本应扩大财政政策空间的时候，却初步缩小财政支出。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为每年1.2万亿美元，这是我们贸发会议估计的4.3万亿美元可持续发展目标资金缺口的一部分。

即使还有粮食和能源进口账单，以及因利率上升而不断升高的借贷成本，但自战争开始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财政结余已经减少了3,150亿美元。

因此，国际投资对国内公共投资起着关键的补充作用。新的税收规则将影响各国传统上通过低税率、财政激励和经济特区来促进(往往也是争取)国际投资的方式。

税收改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机会，不仅从税收收入的角度，而且从吸引投资的角度也是如此。从战略上看，税收竞争将

减少。从实际上看，需要对投资促进工具包进行审查，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使成本高昂的激励措施更具可持续性。

发展中国家也会遇到挑战。发展中国家在应对税改方面面临种种制约因素，因为它们缺乏处理复杂的税收变革的技术能力，而且投资条约中的承诺可能阻碍有效的财政政策行动。国际社会有义务提供帮助。国际社会可以提供技术援助，商定办法来解决由国际投资协定引起的问题，落实保障措施来保护最贫穷国家的税收收入。除此之外，还应该作出更广泛的多边努力，以遏制非法资金流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本报告指明了方向。

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尽管各国面临着由生活成本危机引发的十分堪忧的紧迫问题，但我们必须有能力进行长期投资。因为短期和长期始于同一时刻，而现在正是这个时候。



贸发会议秘书长
蕾韦卡·格林斯潘

鸣谢

《2022年世界投资报告》由James X. Zhan(詹晓宁)领导的团队编写。团队成员有：Richard Bolwijn、Bruno Casella、Joseph Clements、Berna Dogan、Hamed El Kady、Kumi Endo、Anastasia Leskova、Massimo Meloni、Anthony Miller、Abraham Negash、Yongfu Ouyang(欧阳永福)、Diana Rosert、Amelia U. Santos-Paulino、Changbum Son、Astrit Sulstarova、Claudia Trentini、Joerg Weber和Kee Hwee Wee。

以下人员提供了研究支助和投入：Gregory Auclair、Hamidreza Bakhtiarizadeh、Magdalena Bulit Goñi、João de Camargo Mainente、Malou Celander、Antoine Cornevin、Juliette Gailly、Tiffany Grabski、Vicente Guazzini、Maxime Ladrière、Corli Le Roux、Iana Miachenkova、Josef Ostřanský、Hayley Marie Pallan、Sang Hyun Park、Lisa Remke、Samuel Ringier、Rita Schmutz、Baptiste Souillard、Irina Stanyukova、Ilan Strauss、Yihua Teng和Anqi Wang。

Yoseph Asmelash、Chantal Dupasquier、Isabel Garza Rodriguez和Paul Wessendorp以及秘书长办公室提供了评论和意见。

Mohamed Chiraz Baly和Bradley Boicourt提供了统计协助。Chrysanthi Kourti提供了信息技术协助。

Lise Lingo对原稿进行了文字编辑。Thierry Alran负责图表和信息图的设计以及报告的排版，Alexandra Sonia Garcês提供协助。Elisabeth Anodeau-Mareschal和Katia Vieu为报告的印制提供了支持。Nathalie Eulaerts和Sivanla Sikounnavong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Michael Keen担任报告专题章节的首席顾问。专题章节还受益于与维也纳经济大学全球税收政策中心的团队的合作，该团队由Jeffrey Owens(杰弗里·欧文斯)领导，成员包括Ivan Lazarov、Belissa Ferreira Liotti、Ruth Wamuyu Maina和Joy Waruguru Ndubai。

在编写专题章节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在世界投资论坛的启动活动和为讨论草稿而组织的各种专家会议期间，编写团队受益于以下外部专家的评论和意见：Flurim Aliu、David Bradbury、Julien Chaisse、Alex Cobham、Michael Devereux、Lorraine Eden、Javier Garcia-Bernardo、Ana Cinta Gonzalez Cabral、Tibor Hanappi、Liselott Kana、Anita Kapur、Petr Janský、Michael Lennard、Pierce O'Reilly、Zahira Quattrocchi、Augustin Redonda、Tove Maria Ryding和Logan Wort。

编写团队感谢国际组织的同行和其他专家在各个阶段提供的建议、意见和评论，包括以下人士：Vincent Beyer、Martin Dietrich Brauch、Abdul Muheet Chowdhary、Sabrine Marsit、Suzy H. Nikiéma、Marcelo Olarreaga、Joshua Paine、María Florencia Sarmiento、Alessandro Turina、Christian Volpe Martincus和Sebastian Wuschka。

一些中央银行、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许多工作人员也为本报告作出了贡献。

目录

序言	iii
前言	iv
鸣谢	vii
概述	1
全球投资趋势和前景	1
区域外国直接投资趋势	9
投资政策发展	14
全球最低税率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20
资本市场与可持续金融	27

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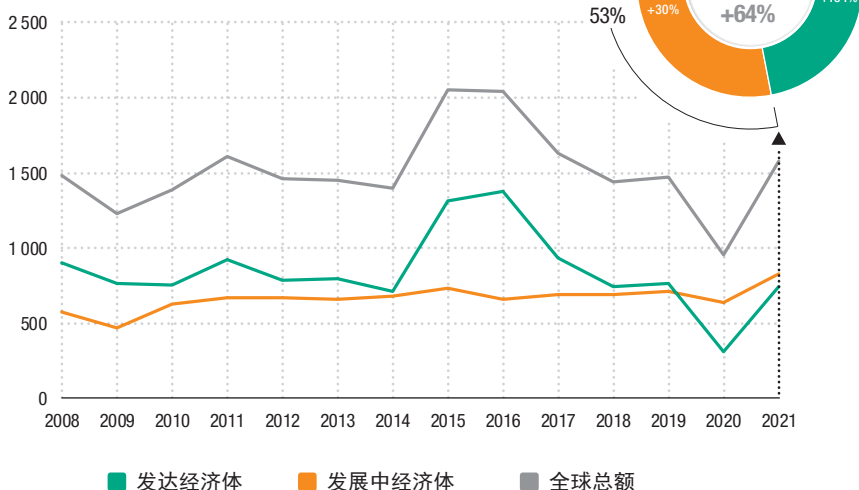
全球投资趋势和前景

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复苏，但前景黯淡

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为1.58万亿美元，较2020年的极低水平增长了64%(图1)。由于宽松的融资条件和大型基础设施刺激计划，并购市场蓬勃发展，国际项目融资快速增长，复苏呈现明显的反弹势头。

图 1.

2008-2021年全球和按经济体类别
分列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10亿美元和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数据库 (<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然而，全球的国际商业和跨境投资环境在2022年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疫情挥之不去的影响，乌克兰战争正导致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粮食、燃料和金融三重危机。由此造成的投资者不确定性可能会给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

其他因素也将对2022年外国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又爆发疫情，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地区又被封锁，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对全球价值链密集型产业的新的绿地投资。通胀明显飙升的主要经济体预期加息，将减缓并购市场的势头并抑制国际项目融资的增长。金融市场的悲观情绪以及经济即将衰退的迹象可能会加速外国直接投资的下滑。

不过有几个稳定因素。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型公共支助一揽子计划实施期跨越多年，可以为国际项目融资托底。跨国企业的跨境并购和跨国金融交易尚未失去力度。从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构成来看，在一些大规模接受投资的地区，特别是欧洲，外国直接投资仍处于历史上相对较低的水平。

但是，整体而言，2021年的增长势头不太可能持续。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可能会呈下降趋势，充其量保持平稳。新的项目活动已经显示出投资者避险意识增强的迹象。2022年第一季度的初步数据显示，绿地项目数量减少了21%，国际项目融资交易下降了4%。

2021年的复苏部分是由创纪录的跨国企业利润推动的

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为所有地区带来了增长。然而，全球增长的近四分之三得益于发达国家的增长(图2)，这些国家的外资流入量达到7,460亿美元，是2020年的两倍多。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并购交易和跨国企业的高水平留存收益。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大规模的公司内部资金流动，也导致了大型投资中心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波动。2021年留存收益高是跨国企业利润创纪录的结果。最大的5,000家跨国企业的盈利能力翻了一番，占到销售额的8%以

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利润之所以很高，是因为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融资成本低，政府支持力度大。

尽管利润很高，但跨国企业对海外新生产性资产的投资意愿依然不强。虽然2021年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国际项目融资增长了68%，跨境并购增长了43%，但绿地投资数量仅增长11%，仍比疫情前水平低五分之一。宣布的绿地投资总价值上升了15%，达到6,590亿美元，但在发展中国家保持不变，仍为2,590亿美元，停滞在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问题令人关切，因为工业新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景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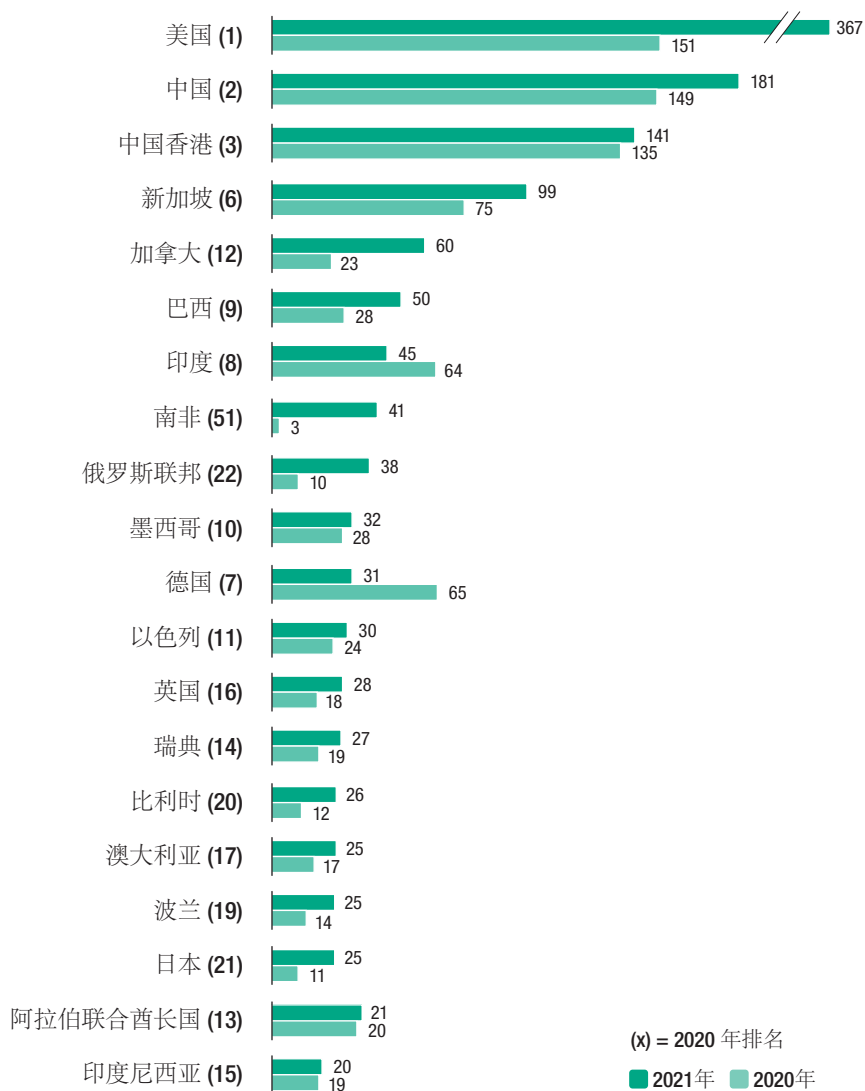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较慢

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速比流入发达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较慢，但仍增加了30%，达到8,37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主要得益于亚洲的强劲增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部分复苏以及非洲的回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金流动中所占份额仍然略高于50%。

- 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20年的390亿美元增至830亿美元。大部分接受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有适度增加。
- 在亚洲发展中地区，尽管疫情一波接一波，但外国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上升，增至历史新高，达到6,190亿美元。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56%，达到1,340亿美元。大多数经济体的资金流入出现反弹，只有少数经济体的资金流入进一步下降。
- 流入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15%，达到390亿美元。2021年，流入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5%，低于2020年的3.5%。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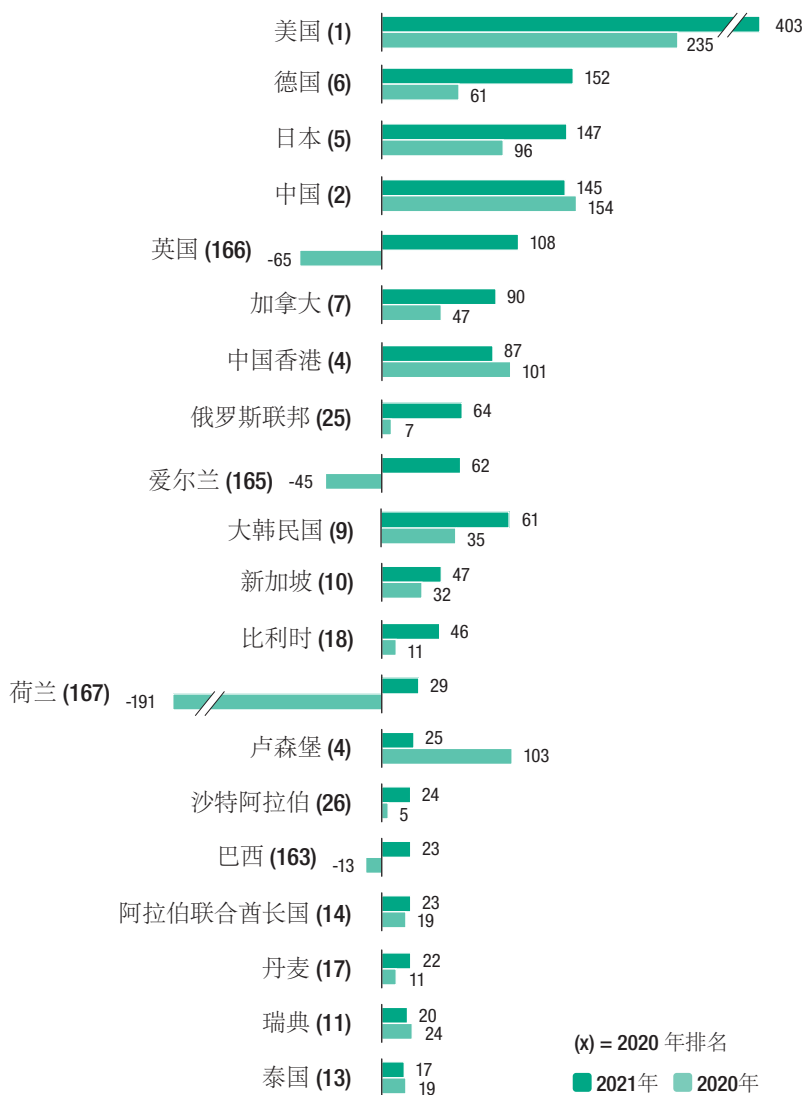
2020年和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排名前20的资本输入经济体(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数据库 (<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图 3.

2020年和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 排名前20的资本输出经济体(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数据库 (<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但投资中心出现大幅波动

2021年，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翻了一番多，从4,830亿美元增至1.3万亿美元。它们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上升到全球流出量的四分之三(图3)。这一增长很大程度上由创纪录的再投资收益和高水平的并购活动推动。2021年，资金中转国的剧烈波动仍在继续。

欧洲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总额从2020年-210亿美元的异常低水平反弹至5,520亿美元。

从北美流出的资金达到创纪录的4,930亿美元。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增加了72%，达到4,030亿美元。流入欧洲联盟(欧盟)和英国的资金翻了一番，流入墨西哥的资金几乎增加了两倍。

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52%，达到2,25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和韩国的跨国企业投资增加。

发展中经济体跨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活动价值增加了18%，达到4,380亿美元。即使在疫情期间，亚洲发展中地区仍然是一大投资来源。2021年，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4%，达到3,94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近四分之一。尽管亚洲发展中地区的总体对外投资有所增加，但总部位于该地区的企业在2021年进行的收购有所减少。跨境并购交易额下降了35%，至450亿美元。总部位于东亚(主要是中国)的跨国企业的收购额大幅下降，从2020年的440亿美元降至仅63亿美元。

可再生能源的热潮推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投资

2021年，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部门的投资大幅增加，增幅达70%。可持续发展目标部门宣布的绿地投资和国际项目融资交易的总价值超过疫情前水平近20%。然而，大部分增长都流向了可再生能源。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他相关部门，包括基础设施、粮食和农业、医疗和水卫项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投资活动(以项目数量衡量)仅部分复苏(表1)。

表 1.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私人投资：2021年项目数量与疫情前水平相比(百分比)

基础设施

运输基础设施、发电和配电(可再生能源除外)、电信

**-11****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发电装置, 所有来源

**+2****水卫项目**

向工业和家庭提供水和卫生设施

**-9****粮食和农业**

对农业、研究、农村发展的投资

**-35****医疗卫生**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投资, 如新建医院

**-25****教育**

基础设施投资, 如新建学校

**+17**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最不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趋势不如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疫情的不利影响持续存在。在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总投资(包括绿地和国际项目融资价值)中, 流向最不发达国家的份额从2020年的19%下降到2021年的15%。在项目数量中的份额从9%下降到6%。

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项目占气候变化投资的大部分。对气候变化部门的国际私人投资几乎完全用于减缓行动; 只有5%用于适应项目。60%以上投资于发达国家, 这些国家85%的项目完全由私人融资。对比之下, 发展中国家几乎一半的项目需要某种形式的公共部门参与。

国际项目融资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投资日益重要。国际项目融资的强劲增长表现可归功于有利的融资条件、基础设施刺激方案以及金融市场投资者对参与需要多个供资者的大型项目的浓厚兴趣。该工具还使政府能够通过私人融资参与来发挥公共投资的优势。

大型、小型和数字化跨国企业的投资趋势各有不同

将贸发会议100强传统跨国企业与最新排名的100强数字化跨国企业和中小企业投资项目新数据集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截然不同的投资趋势。

在过去五年里，100强数字化跨国企业的销售额增速是100强传统跨国企业的五倍，其中疫情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100强传统跨国企业更多地参与绿地投资，而数字化跨国企业则更多地参与并购。数字化跨国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较少，因为它们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实物资产投资就可以进入海外市场。数字化跨国企业和大型跨国企业的国际生产都在持续增长，尽管增长速度不同。相比之下，中小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在下降。在过去五年中，中小企业在绿地投资项目中所占的份额从5.7%下降到1.3%。

具体来看数字化跨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尽管它们的绿地项目投资相对较少，但只要它们进行投资，对发展数字经济的潜在贡献就会很大。除了后勤和销售支持点(占其绿地投资项目的42%)之外，数字化跨国企业还设立了专业服务办公室(24%)、研发中心(14%)和互联网基础设施(10%)。数字化跨国企业的项目中，超过三分之一位于发展中国家。

再来看最小的跨国企业，2020年和2021年它们海外投资的下降，可以归咎于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疫情对小企业的打击尤其严重。然而，这种下降趋势早在疫情之前就开始了，这表明有长期因素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这些因素包括：获得资金的机会不平等，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日益扩大，投资仍然集中于国际企业，而且从政策角度来看，缺乏针对中小企业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措施。贸易和投资的国际政策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2017年之后贸易关系紧张，也可能是导致中小企业比大型跨国企业更容易望而却步的原因。

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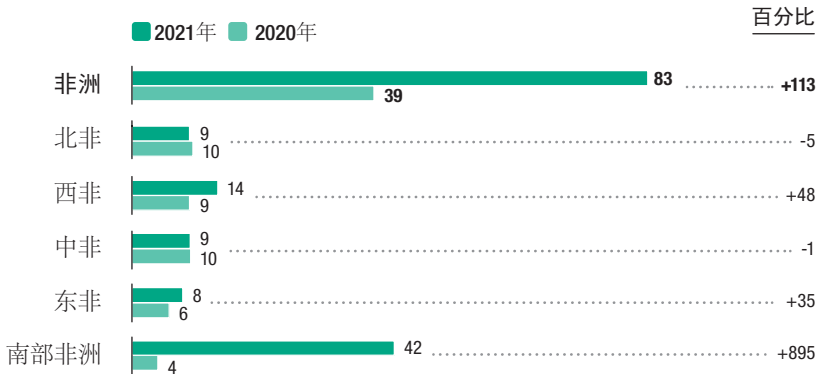
非洲大部分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温和

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20年的390亿美元增至8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2%。但是，在疫情导致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后，大多数接受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呈温和增长。2021年下半年，南非的一笔公司内部金融交易夸大了非洲大陆的交易总额。如果不包括这笔交易，非洲的增长仍算显著，但也只是与其他发展中地区不相上下。南部非洲、东非和西非的资金流动有所增加；中部非洲仍然持平，北非有所下降(图4)。

尽管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总体呈积极趋势，但宣布的绿地投资总额仍然低迷，为390亿美元，仅比2020年320亿美元的低点略有回升。相比之下，针对非洲的国际项目融资交易数量增加了26%(达到116笔)，交易价值回升至1,210亿美元(2020年为360亿美元)。增长主要集中在电力(560亿美元)和可再生能源(260亿美元)领域。

欧洲投资者仍然是非洲外国资产的最大持有者，居首的是英国(650亿美元)和法国(600亿美元)。

图 4. 非洲：2020-2021年按次区域分列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数据库 (<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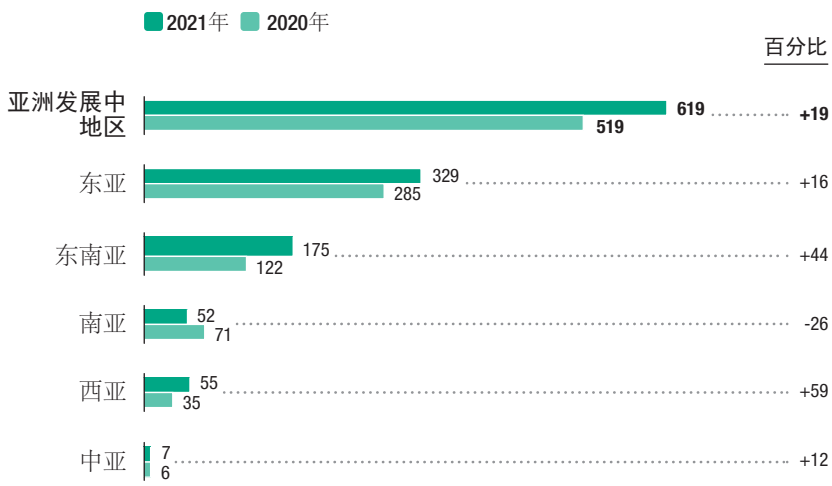
亚洲发展中地区资金流入创纪录

尽管新冠疫情一波接一波，但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增长，达到6,19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凸显了该地区的韧性。亚洲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地区，占全球流入量的40%。

2021年该地区普遍呈现上行趋势，但南亚是唯一的例外(图5)。然而，资金流入仍然高度集中。六个经济体(依次为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印度尼西亚)占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80%以上。

在整个亚洲发展中地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部门的投资大幅增加。这些部门的国际项目融资价值增加了74%，达到1,210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对可再生能源的浓厚兴趣。该行业的项目价值增长了123%，从2020年的340亿美元增至770亿美元。

图 5. 亚洲发展中地区：2020-2021年按次区域分列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10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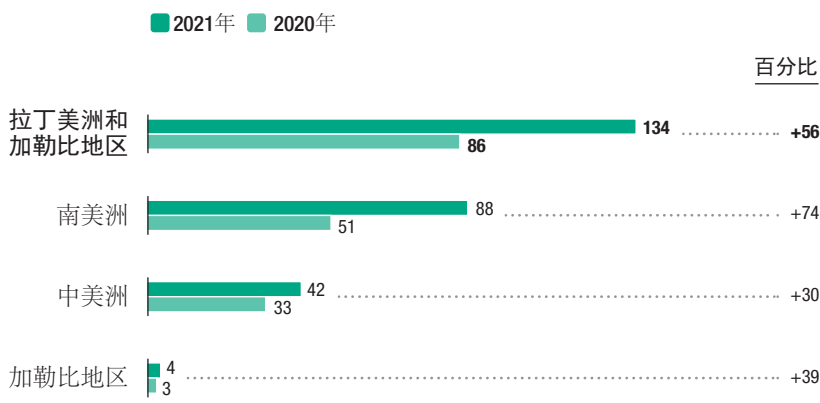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数据库 (<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复苏

2021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56%，达到1,340亿美元，这得益于汽车制造、金融和保险服务、电力供应等传统目标行业的强劲流入量，还有一个推动力是整个地区信通服务的投资创下记录新高。大多数经济体的流入量出现反弹，只有少数经济体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而出现流入量进一步下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所有三个次区域(不包括金融中心)的资金流量都有所增加(图6)。

该地区的跨境并购活动有所增加，所以交易数量有所增加，但净销售总额与2020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为80亿美元。宣布的绿地投资增加了16%，其中大部分承诺的投资投向汽车、信通以及采掘行业。在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巴西)、采矿(整个地区)和可再生能源等大型项目的推动下，国际项目融资交易的价值翻番，超过了疫情前水平。

图 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按次区域分列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10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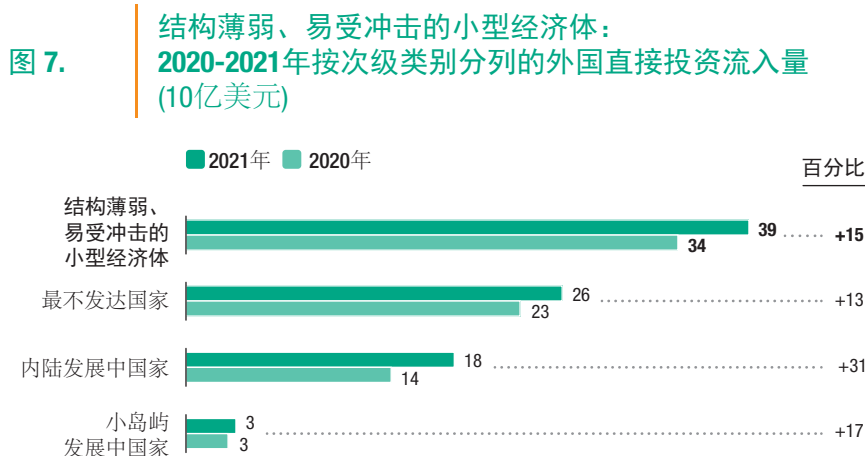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数据库 (<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增长迟缓

流入82个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15%，达到390亿美元(图7)。2021年，流入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5%，低于2020年的3.5%。2021年，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各部门的投资继续下降，特别是在粮食、农业、卫生和教育领域。

2021年，最不发达国家宣布的绿地项目数量和价值继续呈下降趋势。项目数量降至158个，为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绿地投资对于建设生产能力，进而对于可持续增长前景至关重要。按价值计算，宣布的最大项目是能源和天然气供应以及信通领域的项目。

拉长时间线来看，自2011年以来，流入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略有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外部资金来源，但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落后于其他来源；官方发展援助和汇款是迄今为止流入最不发达国家的最大的外部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数据库 (<https://unctad.org/fdistatistics>)。

国际项目融资在大多数国家和各种行业(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部门)是一个日益重要的投资来源。不过，最不发达国家的采掘业仍然是项目融资的主要对象。

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部门多元化。从对最不发达国家生产能力发展最重要的投资类型来看，在这十年中，只有能源生产和配送领域的投资大幅增长，而对私营部门发展和结构变革至关重要的其他基础设施部门和项目的投资几乎没有增长。在疫情期间，对发展生产能力的几个优先部门的投资几乎完全枯竭，致使最近通过的下一个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特别具有挑战性。

投资政策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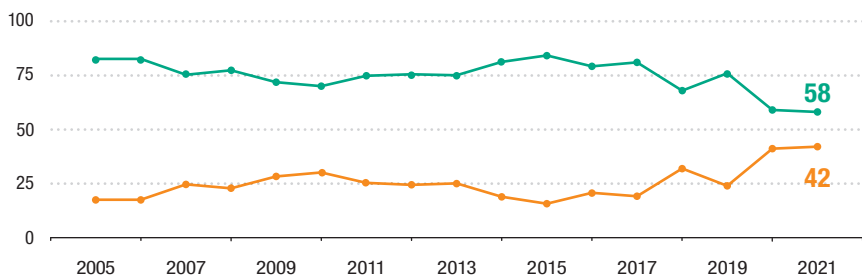
投资政策制定工作放缓

2021年采取的投资政策措施数量(109项)比2020年减少了28%，因为采取疫情相关措施的紧迫性有所消退。然而，加强投资监管的趋势仍在继续，不利于投资的措施所占比例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2%，比2020年高出一个百分点)(图8)。由于监管或政治原因而被撤回的价值超过5,000万美元的并购交易数量保持稳定(14笔)，但价值翻了两番，超过470亿美元。

发达国家大多推出或加强了基于国家安全标准的投资审查制度，或延长了疫情期间为保护战略性公司不被外国收购而采取的临时制度。因此，为了国家安全而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审查的国家总数达到了36个。这些国家合计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63%以及存量的70%(分别高于2020年的52%和67%)。

相反，发展中国家继续主要采取措施放宽、促进或便利投资，这证实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其经济复苏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在所有更有利于投资的措施中，投资便利化措施占了近40%，其次是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新的活动(30%)和新的投资激励措施(20%)。

图 8. 2005-2021年国家投资政策的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投资政策监测。

■ 更有利 ■ 更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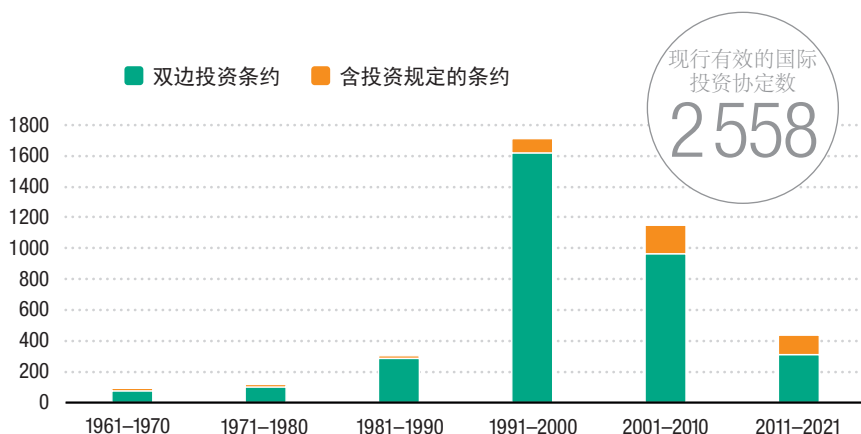
制裁正导致新一轮投资措施激增

2022年第一季度采用的投资政策措施大幅增加(75项, 创下单季度纪录), 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战争。影响进出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非政府控制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制裁和反制裁措施占2022年第一季度采取的所有措施的70%。这种措施包括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彻底禁止或限制, 但也有影响到广泛的对外交易和间接影响到投资活动的措施。其中包括针对金融机构的制裁、贸易和运输限制以及影响到数百个人和实体的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投资条约制度改革正在加快

2021年,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趋势加快。实际终止的条约数量(86项)超过了新签的国际投资协定数量(13项), 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3,288项(包括2,558项现行有效的国际投资协定; 图9)。

图 9. 1961-2021年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数(按十年分列)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国际投资协定导航(IIA Navigator)。

在终止的86项协定中，74项是根据终止欧盟内部双边投资条约的协议终止的。新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载有许多根据贸发会议国际投资协定政策建议修改的条款，目的是在促进发展投资的同时保留监管空间。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国际投资治理，包括更加关注投资便利化、气候变化、反腐败、尽职调查和人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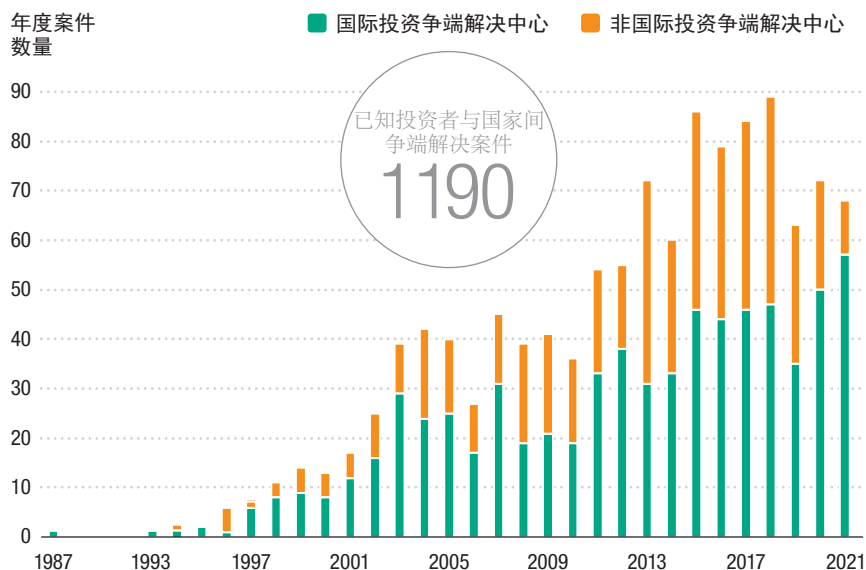
超大型区域协定正日益影响国际投资规则

新一代超大型区域经济协定的数量正在增加。这些协定的全面性和地缘战略相关性决定了它们对国际投资政策具有很大影响。除投资问题外，这些协定还可涵盖货物贸易和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竞争、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公共采购、国有企业监管以及与中小企业相关的政策。超大型区域协定可以放宽市场准入，促进缔约方之间的区域一体化，刺激更多的投资流动。由于此类协定涵盖范围广泛，它们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比双边投资条约更大。

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案件多达1,200起

2021年，投资者根据国际投资协定提起了68起新仲裁，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案件总数达到1,190起(图10)。1990年代签署的两项国际投资协定——《能源宪章条约》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仍然是最常被援引的文书。迄今为止，已知有130个国家和一个经济集团对一起或多起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申诉作了回应。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法庭就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作出了54项实质性决定，其中31项已公之于众。在公开裁决中，11项主要涉及管辖权问题(包括初步反对意见)，4项支持法庭的管辖权，7项驳回管辖权。其余20项是就案情实质问题作出的公开裁决，其中12项裁定国家对违反国际投资协定的行为负有责任，8项驳回投资者的所有申诉。截至2021年底，至少已有807起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诉讼结案。2022年，乌克兰战争使过去和未来可能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类申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图 10. 1987–2021年已知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案件的趋势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导航。

税收政策在世界各地被用来促进国际投资

全球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在过去30年中逐渐下降，从1980年的将近40%降至2021年的25%左右。下调税率主要是为了争夺国际投资，所有地区都是如此，无论国家大小或发展水平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最不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更多地依赖企业所得税，2021年此类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率最高(28%)。

大多数税收激励政策奖励的是利润，而不是新的投资

过去十年所采取的国家投资政策措施显示，所有地区都对投资广泛采用税收激励措施。在采取与税收有关的投资措施的100个国家中，90个国家降低了税收、推出了新的税收激励措施或加大了现有激励

措施的慷慨程度。三分之一以上的财政激励措施(39%)是基于利润的(主要是采用免税期和降低企业所得税)。相反,新的税收激励措施中仅有超过十分之一(13%)是基于支出的,即通过补贴、加速折旧或税收抵免减少资本支出的税后成本,从而奖励投资或再投资。

基于利润和基于支出的激励措施通常还辅之以额外的财政激励措施。间接税和关税(如增值税或进口关税)的税收减免约占亚洲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实行的所有税收激励措施的30%。非洲也经常使用这种办法(占有所有税收激励措施的24%),但欧洲和北美则不太常用(13%)。简化进出口手续、许可证和执照单一窗口机制或简化就业签证手续等工商便利化措施,是各地区结合财政促进计划采用的最重要的非税收促进手段。

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新的激励措施针对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但地区差异很大(图11)。专门针对农业和采掘部门的税收激励措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全球(24%)、非洲(33%)和亚洲(27%)在推出新的税收激励措施时,最经常出现的政策目标是促进国内特定地区的发展。

财政激励措施的管理有待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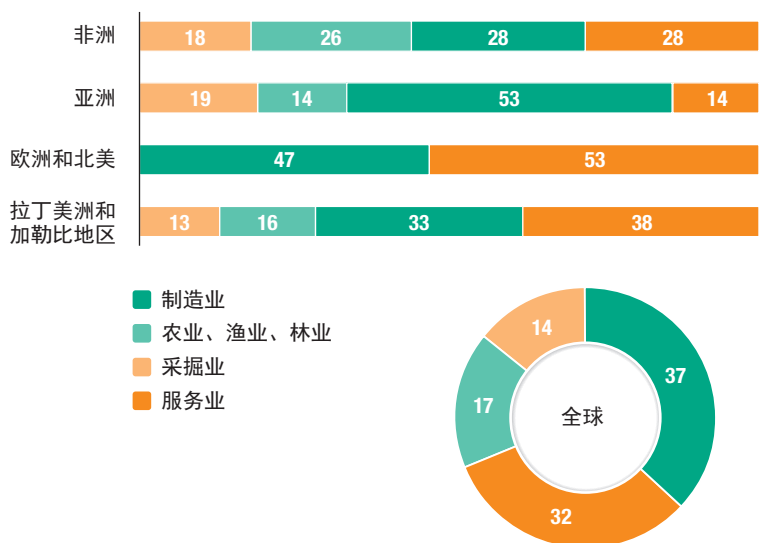
只有在大约30%的情况下,激励是根据自动标准(例如投资额、创造的就业量或投资地点)给予的,而其余的情况则是依酌处权、非公开标准或与投资者的谈判来分配的。此外,在过去十年全世界实行的所有投资税收激励措施中,只有大约一半是有时限的,其中非洲(35%)和亚洲(40%)的比例较低。这对被减免的税收、开展影响评估的可能性以及造成市场扭曲的可能性都有重要影响。

国际投资协定规定的义务可能会与税收措施相冲突

国际投资协定规定的国家义务可能会与国家层面采取的税收措施产生冲突。如果税务当局(作为国家机关)的行动和更普遍的税收

图 11.

2011-2021年按地区分列和全球新的投资税收激励措施部门分布情况(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投资政策监测。

政策调整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则根据国际投资协定国家可能须承担国际责任。国家还可能面临根据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的税收方面的申诉。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在基于国际投资协定的165起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案件中，投资者对税收相关措施提出了质疑。

投资政策制定者和税收政策制定者必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以使这两个政策领域更加步调一致。贸发会议2021年发布的《国际投资协定税收政策制定者指南》包含了国际投资协定改革选项，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与税收政策产生冲突的风险。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尽量减少投资政策措施与全球税务条约网络之间产生冲突的风险，该网络与国际投资协定制度一样，也包含了3,000多项协定。

全球最低税率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支柱二税改将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税收架构

在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背景下，经141个管辖区在其《包容性框架》内开展讨论，原则上已经就推出跨国企业全球最低税率达成一致。这项被称为BEPS支柱二的改革，将对大型跨国企业(营收超过7.5亿欧元的企业)的海外利润适用15%的最低税率。通过一套复杂的机制，将在国内税收中增加一项补足税，以确保在每个国家，跨国企业缴纳的税款至少相当于外国子公司“超额”利润的15%；“超额”利润即超过与东道国内实际经济活动(资产和雇员)相关的数额(称为排除项)的利润。支柱二税改计划在2023年实施，但人们普遍认为时间过于紧迫。

BEPS支柱二税改旨在阻止跨国企业将利润转移到低税国家，并减少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进一步的目标是稳定国际税收规则并减少税收不确定性，为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并防止会导致投资环境恶化的单方面措施激增。此外，增收的税款将有助于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调动国内资源。

对跨国企业利润适用最低税率会对国际投资和投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税收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税率被纳入跨国企业投资决策的计算，国家之间的税率差异会影响跨国企业的位置选择。因此，税率和优惠方案(财政激励措施)是投资政策工具包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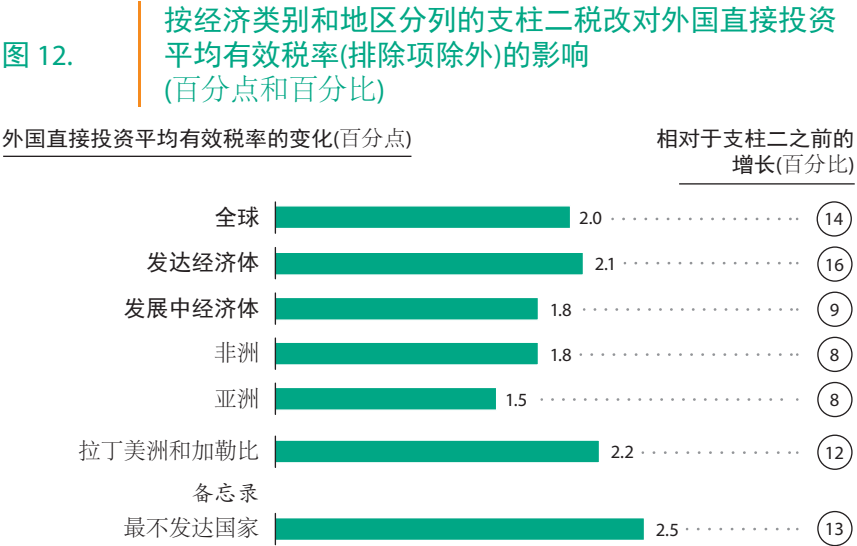
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有效税率远低于总体税率，将受到最低税率的影响

在过去三十年里，为了吸引国际投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不断下降。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都在25%左

右。外国子公司为报告利润缴纳的有效税率往往更低，平均不到20%，主要原因是东道国提供财政激励措施。

然而，跨国企业支付的税率往往远低于其海外收入的标准有效税率，因为它们可以将部分利润转移到低税区。因此，跨国企业的海外收入实际税率平均约为15%，远低于总体税率。本报告引入了一个新的指标，即外国直接投资有效税率，它反映了跨国企业为其全部外国直接投资收入(包括转移利润)缴纳的平均税率。

支柱二税改将增加跨国企业为海外利润所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第一，跨国企业将减少利润转移，因为从中获得的利益将减少，它们将支付东道国的税率。第二，如果外国子公司支付的有效税率低于在东道国所报告利润的最低税率，则需要缴纳补足税。保守估计跨国公司面临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效税率预期将上升2个百分点，但有一定的地区差异(图12)。这相当于跨国企业向东道国支付的税款将增加约15%，而直接受税改影响的大型跨国企业缴纳的税款增幅会更大。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的估计。

对支柱二税改之前和之后外国直接投资有效税率的分析表明，税改的着力点主要是通过对离岸金融中心适用最低税率而减少利润转移，而不是在其他地方适用最低税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平均而言，这些国家的有效税率较高，利润转移的可能性较大。

预计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将从税收增加中获益匪浅。离岸金融中心将失去从跨国企业外国子公司收取的很大一部分企业所得税收入。对于较小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有效税率较低)而言，实施补足税可能会在征税收入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增加税收可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 and 分布产生影响

税收增加的另一面是，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所得税增加将对投资额产生潜在的下行压力。根据基线情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潜在下行幅度约为2%。该项预估似乎较为温和，但仅涉及生产性投资；不能将其与标准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历史趋势直接比较，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金融成分引起的差异很大。

与此同时，减少税率差异将导致投资从低税区向高税区转移，发展中国家因企业税率较高而相对受益会更多。转移效应可以抵消投资额效应造成的投资损失。但是，这不会自动发生。在一个税率差异缩小的世界里，让国家获益更多的将是影响投资决定的其他因素的改善，包括与基础设施以及监管和制度环境有关的因素的改善。

任何国家都不能无视此次税改

为实施支柱二税改而设计的机制足以让数量相对有限的投资者母国(如二十国集团和经合组织成员国)适用补足税，以使税改的效果趋于普及。东道国(包括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可以选择(在母国征收补足税之前)先征收补足税以保护税收收入。但是，竞争性税率或传统税收激励措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效力将被削弱。

投资促进机构和经济特区应对投资激励措施进行紧急审查

支柱二税改因此将对国家投资决策者和机构及其标准工具包产生重大影响。令人担忧的是，投资促进机构和经济特区管理者目前对税改的认识程度仍然很低。在贸发会议投资促进机构年度调查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答复者表示，他们还不知道要改革，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答复者已经开始评估税改的影响。他们需要尽快采取行动，至少应审查目前使用的激励措施，评估对现有投资者投资组合的影响，并确定留住投资和促进投资的最佳办法。

财政激励措施被广泛用于促进投资，包括被用作大多数经济特区价值定位的一部分。具体来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常用的激励措施中：

- 加速折旧及亏损结转将继续有效。
- 免税期和免税对投资者将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吸引力。
- 其他一系列激励措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取决于措施的具体设计。

促进投资的一些财政政策选项仍将保留下来，包括放大所谓的实质性排除给投资者带来的好处；转向受支柱二税改影响较小的激励措施；或减少支柱二税改未涵盖的但对投资决定有影响的税收。本报告详细说明了支柱二税改对最常见的投资财政激励措施的影响(表2)。

有必要审查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的各种激励措施组合，这为全面反思这些措施提供了机会。近年来，贸发会议一直敦促各国开展这种评估，以期将激励措施转向促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更好表现的投资，特别是将激励措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从降低税率的激励措施和免税转向与实际资本支出挂钩的激励措施(后者受支柱二税改的影响较小)非常符合这一目标，因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部门的投资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

表 2.

支柱二税改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激励措施的影响简要评估

激励措施类型	支柱二税改的影响	激励措施类型	支柱二税改的影响
a. 降低税率		b. 税款减免	
零税率	●	加速折旧和直接费用化	●
低于15%	●	亏损结转	●
高于15%	●	可扣除的合理费用	●
c. 免税		d. 与收入所涉税有关的其他激励措施	
免税期	●	预扣税激励措施	●
特定豁免：地点、部门、实体	●	知识产权盒	●
参与免税	●	税收抵免	●
		资本利得税激励措施	●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 影响很小/无影响
● 影响很大
● 影响不定/不明

国际投资协定谈判者应意识到风险增加

税收改革对国际投资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投资协定谈判者也有重要影响。他们需要考虑国际投资协定的承诺可能对实施支柱二税改的关键规定造成潜在限制。如果东道国因国际投资协定及其关于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的规定而无法征收补足税或取消激励措施，则依据全球最低税率而增加的税收将归于母国。东道国将失去税收收入，却得不到吸引投资的好处。现有的老一代国际投资协定(主要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现行有效的协定)可能会带来诸多问题。

超过三分之二的新投资在税改“范围内”

税改对投资政策的战略影响也很重要。全球最低税率最初仅适用于合并收入超过7.5亿欧元的跨国公司。这似乎遗漏了很大一部分潜在投资者，各国可以继续通过财政措施来争夺这些投资者，而不受新规则的影响。但是，这一门槛涵盖了过去五年中开展的新投资项目的三分之二以上，发展中地区的比例甚至更高(图13)。此外，即使一开始许多公司仍在税改范围之外，但越来越多的外国直接投资由最大的跨国企业开展(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正在下降)，加上预期门槛值将逐步降低，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低税率将适用于几乎所有外国直接投资。

来自低税区的竞争减少可能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尽管如此，随着竞争从税收杠杆转向其他影响投资决定的因素，从财政激励转向经济激励，许多国家可能仍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们无力承担提供基础设施或补贴所需的大量前期资金承诺。

图 13. 2015-2021年年收入超过7.5亿欧元的跨国企业的绿地投资项目所占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金融时报》旗下的“fDI Markets” (www.fdimarkets.com)。

时不我待

展望未来，支柱二税改的许多重要细节仍有待确定。此外，支柱二税改的最后采纳仍然面临重大政治障碍。所以，许多国家可能倾向于采取“观望”态度。然而，税改的潜在影响如此之大，谨慎的做法是尽快审查税改建议、评估政策选项并准备应对措施。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加强合作和技术能力，以确保有效参与关于税改的最终形式的谈判进程。

尽早参与并为税改做好准备也将有助于减少跨国企业的税收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成为投资的障碍。此外，在这一调整期内，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延长提供优惠税收待遇或激励措施的长期法律承诺。

发展中国家需要支持：3项关键行动

最后，由税务机关实施BEPS支柱二税改的过程将极为复杂，将税改转化为投资政策、激励机制以及投资促进机构和经济特区的价值定位的过程也同样复杂。此外，国际投资协定所施加的限制对发展中国家税收的影响也是令人关切的一大因素。国际社会应在《包容性框架》内进行讨论的同时或作为讨论的一部分，减轻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的制约因素：

- 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以支持BEPS的 implementation 和投资政策调整。
- 采取多边解决办法，消除国际投资协定在实施方面的制约因素，减轻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方面的风险。
- 作为权宜之计，可设立一个机制，将发达母国增收的任何补足税返还给发展中东道国，这些税收本应归发展中东道国，但它们由于能力或条约限制而无法征收。

资本市场与可持续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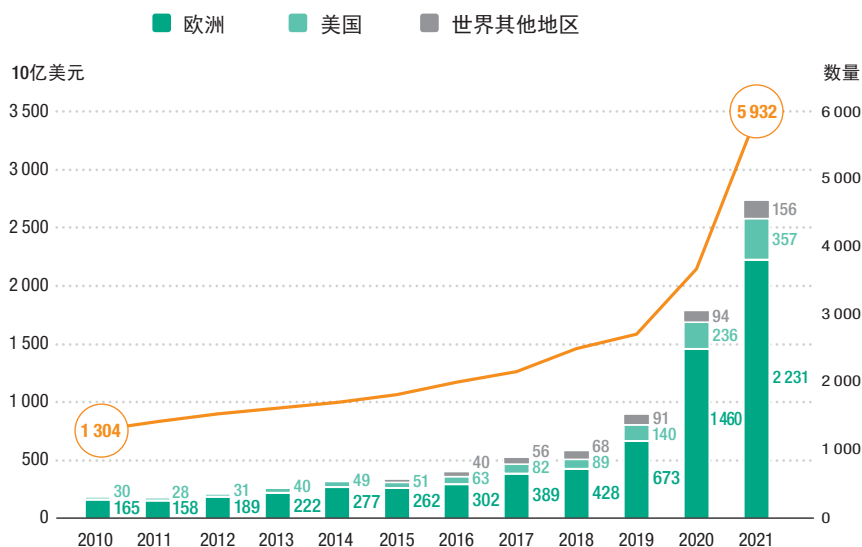
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投资产品正在蓬勃发展

在整个疫情期间，全球资本市场的可持续金融都出现了强劲增长。据贸发会议估计，2021年全球金融市场上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投资产品价值达5.2万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了63%。这些产品包括(一) 可持续基金；(二) 可持续债券，包括绿色债券、社会责任债券和混合可持续发展债券。

截至2021年底，可持续基金数量达到5,932只，较2020年增长了61%。这些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达到创纪录的2.7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53%(图14)。

图 14.

2010-2021年可持续基金数量和资产管理规模
(10亿美元和数量)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晨星数据。

注：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2020年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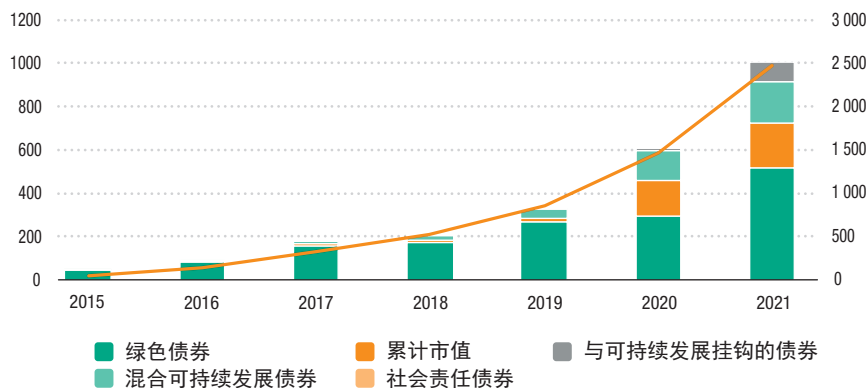
可持续基金的增长大部分仍集中在发达市场。欧洲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市场，占资产管理规模的81%。可持续基金占欧洲基金市场资产的18%，说明该市场相对成熟，而且欧洲可持续金融监管发挥了促进作用。美国是第二大市场。但是，可持续基金仅占其整个基金市场的1%。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可持续基金市场，资产管理规模接近500亿美元。

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尽管近年来可持续基金增长迅速，但在全球基金市场的占比仍仅为4%左右。第二，现有大部分可持续基金是自称的，缺乏一致的标准和高质量的数据来评估其可持续性资质和影响，从而引发了“漂绿”担忧。第三，发展中国家大多没有进入可持续基金市场。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发展自己的可持续基金市场或从国际市场获益方面面临巨大障碍，因为它们的市场规模有限，而且人们认为它们的资本市场风险较高。

2020年以来，贸发会议一直在监测800多只可持续股票共同基金。整体而言，这些基金比传统的同行基金表现出更好的可持续性特征。然而，它们的可持续性评级差异很大，表现不佳的基金没有达到它们自称的可持续性资质。例如，在气候评级方面，无论是侧重于绿色投资的主题基金，还是一般的可持续基金，其表现往往都好于整体基金市场。但约25%自称绿色的基金对矿物燃料的净敞口超过5%(某些情况下高达20%)，导致它们的“绿色”资质受到质疑。

2021年，可持续债券市场也继续强劲增长(图15)。新的可持续债券发行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包括绿色债券、社会责任债券和混合可持续发展债券，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挂钩的债券)。可持续债券发行量的增加在新兴市场尤为明显。未偿可持续债券的累计总价值现在估计接近2.5万亿美元。欧盟和企业部门继续将社会责任债券和混合可持续发展债券发行量推向新的高度。

图 15. 2021年可持续债券市场的增长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环境金融和气候债券倡议的数据。

要将可持续性纳入主流，机构投资者仍有一段路要走

2021年，公共养老基金持有的资产规模超过22万亿美元，几乎占全球养老基金资产的40%。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增至11万亿美元。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资产配置和积极所有权，对被投资方和可持续投资市场施加重大影响。贸发会议对全球排名前100的公共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可持续性整合的做法进行的分析表明，尽管自2020年以来报告可持续性业绩的机构投资者数量有所增加，但大多数基金(53家)仍未报告。主权财富基金的透明度仍然低于公共养老基金。不报告可持续性业绩的基金总部设在中国、日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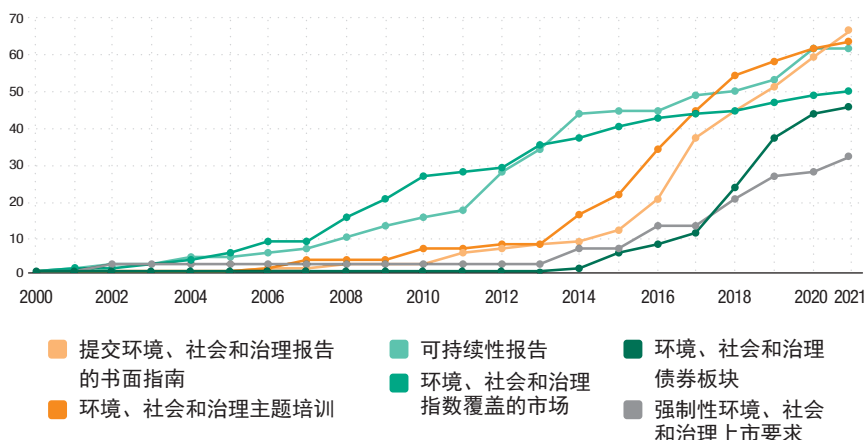
在47只发布可持续性整合信息的领跑基金中，许多基金坦承，环境、社会 and 治理问题构成重大风险，基金的投资策略和政策作出了相应改变。这些基金中的大多数已努力推出内部政策和准则，以支持将环境、社会 and 治理或可持续发展目标视角纳入其投资战略，它们通常会预测过渡风险，并将最迟在2050年实现投资组合净零排放的目标。

证券交易所在促进可持续金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证券交易所和其他市场经营者继续将环境、社会 and 治理考虑因素纳入市场基础设施(图16)。越来越多的交易所为发行人提供关于环境、社会 and 治理信息披露的书面指南,其数量从2015年的仅13家增至2021年底的63家。为发行人和投资者提供环境、社会 and 治理主题培训的证券交易所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超过一半的证券交易所现在提供年度培训。近年来,在交易所和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支持下,提交强制性环境、社会 and 治理报告的做法也呈上升趋势。强制性环境、社会 and 治理披露规则所涵盖的交易所数量(目前为30家)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一倍多。

交易所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参与“性别平等鸣钟”年度活动的交易所数量已从2015年的仅7家增至2022年的超过110家。除了提高认识之外,交易所还支持为性别平等主题投资产品调动资金,改善妇女进入金融市场的机会,并促进妇女更多地参与企业董事会。

图 16. 2000-2021年证券交易所可持续性趋势
(交易所数量)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可持续证券交易所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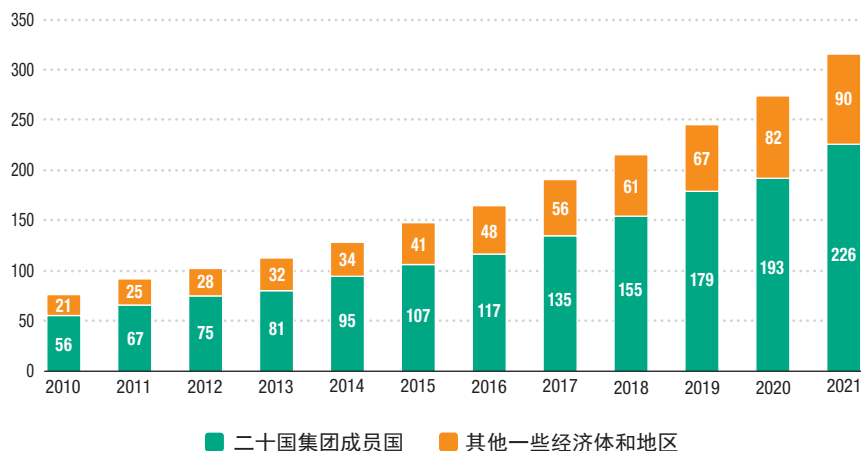
政策、法规和标准正在迅速发展

伴随着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投资产品的兴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原则和标准。其中许多是由私营部门推动或通过国际倡议制定的，关于产品、披露和可持续性整合的大量自愿标准就是例证。最近，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都在加紧努力，通过制定必要的政策和监管框架，支持可持续金融的增长。

贸发会议对可持续金融措施和法规的监测显示，截至2021年底，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约93%的35个经济体和国家集团有316项政策措施和法规生效(图17)。其中超过40%的措施是在过去五年推出的，仅在2021年就采用了41项新措施。至少有45项措施仍在酝酿之中。这些监管趋势表明，制定可持续金融政策的步伐正在加快。

图 17.

2010-2021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可持续金融政策措施和法规 (数量)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在查明的政策和法规中，几乎有一半与可持续性披露有关。关于资产管理、可持续银行业和可持续保险业的具体部门法规是第二大政策领域，约占所有措施的20%。在分类法、产品标准和碳定价这三个相对较新的政策领域，政策和监管缺失更为明显。但是，正在制定中的许多措施都集中在这几个领域。贸发会议数据集所涵盖的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国家可持续金融战略或框架。

在国际层面，协调和巩固可持续金融法规和标准的努力在2021年势头强劲。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继续在可持续金融方面开展工作，为全球证券监管机构提供指导，制定关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披露的国际标准的工作也在加快推进。2021年至2022年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成立了新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并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签署了协议。所有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为企业提交可持续发展报告设置一个新的全球基线。

资本市场的气候行动刻不容缓

全球经济脱碳的努力对企业和投资界都有着重要影响。减缓气候变化风险也为投资者和发行人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

对在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交易所上市的市值前100名发行人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1)的研究显示，不同市场的上市公司的排放量差异很大。一些市场在向净零经济转型期间特别容易遭遇系统性风险。例如，在分析的二十国集团企业中，超过一半的范围1排放来自仅在五个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交易所、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应监控公开市场上市公司的排放，以确保向净零经济的有序过渡。

证券交易所在帮助其市场适应低碳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交易所现在都在举办符合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队要求的企业气候披露培训。为了帮助交易所引领向气候适应型市场的过渡，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与联合国气候行动和金融问题特使合作，推出了一项自愿行动计划和一套相关工具。

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对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贡献，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现在的重点是强化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投资产品的诚信，以解决漂绿行为或假冒可持续发展投资产品问题，并协调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披露。

要建立一个地域上更加平衡的市场，将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对于市场欠发达、监管和标准制定能力较弱的国家，需要提供技术援助，以支持市场发展并加强可持续发展报告生态环境。

贸发会议通过全球可持续金融观察站的工作和其他与可持续投资有关的方案，如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可持续机构投资方案以及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方案，致力于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合作，按照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增加金融市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说明

本概述根据《2022年世界投资报告：国际税收改革与可持续投资》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22.II.D.20)
中所作的深入分析编写。

历年的世界投资报告

WIR 2021: Investing in Sustainable Recovery
WIR 2020: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Beyond the Pandemic
WIR 2019: Special Economic Zones
WIR 2018: Investment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ies
WIR 2017: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WIR 2016: Investor Nationality: Policy Challenges
WIR 2015: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WIR 2014: Investing in the SDGs: An Action Plan
WIR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WIR 2012: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
WIR 2011: Non-Equity Mode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WIR 2010: 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
WIR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WIR 2008: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
WIR 200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WIR 2006: 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WIR 2005: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WIR 2004: 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
WIR 2003: FDI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WIR 200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WIR 2001: Promoting Linkages
WIR 2000: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Development
WIR 199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WIR 1998: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WIR 199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Market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WIR 1996: 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rrangements
WIR 1995: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WIR 1994: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mployment and the Workplace
WIR 1993: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WIR 199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Engines of Growth
WIR 1991: The Triad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投资和企业司

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是负责所有投资和企业发展相关问题的全球卓越中心。

两项旗舰产品

世界投资论坛
《世界投资报告》

七项核心服务

全球投资信息和研究
核心数据产品和服务
《全球投资趋势观察》
《跨国公司》期刊

投资政策和条约

投资政策审评
国际投资协定
投资政策服务站

投资促进和便利化

投资便利和促进
工商促进项目
投资指南

可持续投资

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
家族企业促进可持续发展
负责任的农业投资原则
知识产权促进发展
可持续的机构投资伙伴关系

企业发展

创业发展
经营技术能力建设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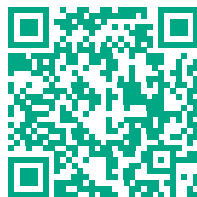
会计和报告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

世界投资网络

五项全球政策框架

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
国际投资制度改革一揽子计划
投资便利化全球行动菜单
创业政策框架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体报告核心指标指南



worldinvestmentreport.org

如何获得出版物

出售的出版物可在世界各地通过联合国出版物的经销商购买。也可通过邮购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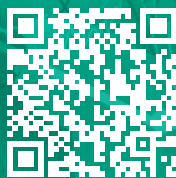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Customer Service
c/o National Book Network
15200 NBN Way
PO Box 190
Blue Ridge Summit, PA 17214
email: unpublications@nbnbooks.com

unp.un.org

欲索取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研究的进一步信息，请联系：

Division on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Palais des Nations, Room E-10052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Telephone: +41 22 917 4533
Fax: +41 22 917 0498
unctad.org/diae



worldinvestmentreport.org